

文屏亮点

脉络清晰、细节扎实、情感细腻，《啊摇篮》虽然没有恢宏的叙事，却通过战争背景下对延安保育员群体的描绘，再现旧时延安的风土人情、共产党人的精神面貌，以及一群女共产党人的光辉形象。这是，那些用鲜血和生命守护红色后代的人们，写下的关于爱的“红色童话”。

《啊摇篮》：战争年代的“红色童话”

钟玲

有温馨的时刻，也有心痛的瞬间，有战争的无情与残酷，也有人性的美好与善良。记不清有几次泪雨滂沱，为战争年代里太多生死离别的悲伤，也记不清有多少次热血沸腾，为那个时代里人们坚定不移的信仰，以及人与人之间爱与温情、爱与忠诚。

由林柯执导，海清、周也、李泽锋等人主演的《啊摇篮》本周已收官，这部根据真实故事改编的40集电视剧，讲述了丑子冈、沈元晖、曹和静等革命工作者，为保护红色后代出生入死浴血奋战的经历。

所有的故事，围绕着于1940年成立于延安的中央托儿所展开。

关于当年的延安，关于那时的保育院，过往已有多种形式、不同题材呈现过那段历史，但无论是电影还是舞台剧，大多侧重于还原保育院的工作人员护送孩子告别延安、辗转进京的曲折经过，但电视剧《啊摇篮》却从托儿所成立开始到迁址进京结束，完整地展现了延安中央托儿所十年间的风雨历程。

宝塔山下、延水河畔，只有6孔窑洞的中央托儿所成立了，倔强、理智、做事雷厉风行的共产党员丑子冈，放弃了自己去前线的理想，变成了这里的“丑妈妈”。托儿所里有中央领导的孩子、革命烈士的遗孤、抗战将士的子女，为了这些孩子的成长，丑子冈和她的战友们经历了一系列的磨难，也攻克了一个又一个困难——物资匮乏时，丑子冈四处“化缘”；“大战百日咳”时，丑子冈到处寻找治病的良药，沈元晖运用自己的知识带着战友们隔离、护理病人；“挥别延安”时，丑子冈“身先士卒”，小葫芦被绑架她对着敌人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为保护月月的生命安全她奋勇出击……

还有，在托儿所遭遇敌机轰炸时，为追逐爱情来到延安的唐素素，虽然平时有些幼稚，却会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用自己的身躯保护孩子；在丑子冈遭遇敌人围捕时，自己还是个孩子的保育员困困，勇敢地向敌人开枪，引开了对方却再也未能睁开双眼；在争渡黄河时，视孩子为生命的罗爷爷，为保护孩子们负伤而后牺牲……

一桩桩温暖的小事，一次次痛苦的离别，一个个丰满的人物形象，以及战争缝隙里的甘与苦、悲与欢，构成了《啊摇篮》时而温柔时而悲情的底色。而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情绪的不断切换中，“整风运动”“敌机轰炸”“特务偷袭”“刘华北之死”“更名洛衫托儿所”“接待中外记者参观团”……这些来自真实历史事件的一个个鲜为人知的历史片段，也在那些富有献身精神的先行者的奋斗故事



里一一浮现。若不是《啊摇篮》对这些场景进行的“复原”，又有谁知道这些往事呢——刘伯承元帅的女儿刘华北，在中央托儿所遭到了暗杀，去世的时候只有6岁；从延安到西柏坡到落脚北京，从最初的7个孩子到后来告别延安时的96个孩子，众多红色后代在中央托儿所度过童年，那其中，还有一些人们熟悉的名字：毛泽东的女儿李敏、李维汉的儿子李铁铮；1947年，国民党轰炸延安，中央托儿所随第一批中直机关撤退，在撤退途中，300多人、100多辆马车的队伍遭到敌人猛烈袭击，幸运的是，最终这些孩子无一伤亡跟随解放军进入北京……

不只是故事的架构遵循历史，《啊摇篮》中的大部分角色都在现实中确有其人，除了丑子冈、沈元晖、曹和静三个托儿所元老级人物，周桂枝、寇英城、任宝珍等保育员和托儿所里的一些孩子都是真实存在的，且沿用了真实姓名。

真人、真事、真历史，在看似有限的发挥空间里，《啊摇篮》对于人物的刻画却非常细腻，从人物的性格，从人物的情感——

龙槐生、葛六斤、傅连璋……虽是绿叶，剧中却不乏这些有血有肉、性格迥异的男性形象。就如陕北汉子龙槐生，初见时憨厚

朴实、头脑简单，但也心地善良，从不情愿到心甘情愿，这个托儿所的“编外人员”为托儿所做了很多事。在与保育员的交集中，他一点点地改变，从不着调的“混混”成为满怀热忱英勇牺牲的战士，他的内心发生了质的改变。

剧中的女性角色都富有鲜明的个人色彩，泼辣的丑子冈，也有片刻对丈夫的柔情蜜意；内敛的沈元晖，也会在工作期间没有人听指挥时大发雷霆；任性的唐素素，这个根据多个人物原型而虚构的原创人物，在十年间不断成长，她理解了何为使命，也理解了爱人的信仰；质朴的农妇马五婶，偶尔霸气彪悍、偶尔呆萌可爱，为救赎自己的过错，留在托儿所多年一直无偿奉献……

她们的人设并不完美，她们会胆怯、会嫉妒、会不知所措，也会烦恼自己的事业、爱情、家庭，《啊摇篮》并没有以仰视英雄的角度，来刻意凸显她们的伟大，而是以微小的细节，着力挖掘她们的内心世界和成长蜕变，以此展现她们人性中的真、善、美。

而她们彼此之间的革命友谊，她们与孩子之间胜过亲人的特殊情感，她们的爱情、亲情，剧中这些情感的刻画，也都在为角色本身服务，让她们更有人情味道。

与每一集的剧情相对应，《啊摇篮》每一集的片尾都加入了一些角色的原型人物接受采访的片段，或是曾经在那工作过的保育员，或是在那里长大的孩子们，他们都已白发苍苍，那一段段对当年经历的追忆，为这部剧增添了一份历史的真实感、厚重感。

若不是这些亲历者的口述，人们怎会知道，剧中那些闪耀人性光辉的一幕幕，原是真真切切发生过的？争渡黄河九死一生，马背上的摇篮在山间摇摇晃晃，都是血肉之躯，他们的身影却是那样高大，为信仰而战的他们，一生平凡，却是真正的英雄。

出彩的角色、扎实的细节决定了一部剧的成功，因此，他们的奉献与牺牲才如此打动人，才能让人们感知到：他们面对每一个孩子的怜惜与疼爱，面对战友牺牲后内心的痛苦与挣扎，和不曾有过一丝动摇的付出无悔。

脉络清晰、细节扎实、情感细腻，《啊摇篮》虽然没有恢宏的叙事，却通过战争背景下对延安保育员群体的描绘，再现旧时延安的风土人情、共产党人的精神面貌，以及一群女共产党人的光辉形象。

穿越历史的尘烟，《啊摇篮》虽然总会让人想起战争的残酷，但孩子们的天真，丑子冈们“永远坚定的眼神，却会让人在心中燃起希望的火种，这是，那些用鲜血和生命守护红色后代的人们，写下的关于爱的“红色童话”。

诗情画意



《风吹过稻田我就想起您》 黄宇婕绘

定风波·水稻低头掀哀浪

惊悉袁隆平院士逝世，不胜哀悼，特填《定风波》词一首，以表敬仰之情，哀悼之意。

苏青

五月蒲风起朔风，斑竹滴泪悼袁公。水稻低头掀哀浪，悲唱，伤心震彻九州同。赤子情怀千古颂。两梦，寰球仓廪暖充实。禾下乘凉悠自在，爱戴，福泽万世建殊功。

玫瑰剧评



李一庚

2003年，改编自前苏联剧作家柳德米拉·拉苏夫斯卡雅《亲爱的叶琳娜谢尔盖耶夫娜》的话剧作品《青春禁忌游戏》，首次被搬上中国话剧舞台时，曾在国内话剧艺术界引起轰动。作为一部严守“三一律”的剧作，《青春禁忌游戏》以其犀利的社会视角、尖锐的矛盾冲突和跌宕的故事情节给观众带来了感官和心理的双重冲击。时至今日，国家话剧院版的《青春禁忌游戏》仍作为剧院的保留剧目，一直在不断复排复演。

在话剧舞台上，只要提起俄罗斯戏剧，无论是创作者还是观众都会在脑海中冒出一个“刻板印象”——以斯式体系为主导的、精益求精的体验派戏剧，主导了大多数的俄罗斯戏剧在舞台上的呈现。话剧版《青春禁忌游戏》的导演查明哲，拥有着非常完整的斯式体系创作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这些特点反映在其作品上，可谓是将俄国戏剧的美推向至一个巅峰，精美的道具布景、准确的舞台调度还有饱含着激情的人物表演。该作也影响了后续十几年里不少专业剧团或是学生习作对于《青春禁忌游戏》的创作风格。

诚然，一部“出道即巅峰”的《青春禁忌游戏》有太多值得学习和借鉴的内容，哪怕原原本本将其模仿下来，对于大部分观众来说也能得到观感上的满足。但对于经典作品，只是模仿就够了吗？对于有追求的创作者来说，绝不仅仅是复制经典就可以满足创作欲的。

将于2021年6月11日至14日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上演的话剧《我的世界非黑即白》，同样改编自《亲爱的叶琳娜谢尔盖耶夫娜》，但在舞台上的呈现却是一番截然不同的景象。

原作中四个学生为了修改考试成绩，在老师叶琳娜生日当晚，无所不用其极的利诱、恐吓、威胁，直到局面彻底失控。《我的世界非黑即白》在剧本方面对原作进行了深度的解构，改编后的故事适当缩减了原剧中对于故事背景和情节更迭的赘述，而是将重点放在了师生之间三观相悖的对抗上。同时，此次改编也减少了“翻译腔”“话剧腔”等传统外国戏剧中不符合现代中文语境的台词，并加入了一些时下流行的元素，旨在塑造新质感的同时，更好地帮助观众理解故事情节。除了剧本上的改动，《我的世界非黑即白》在表演方面的设置也非常具有挑战性——剧中不再有专门扮演老师的演员，而是其他演员轮番饰演老师的角色，通过演员们不断“跳进跳出”不同的角色，最大限度调动起演员们创作的积极性。

戏说不是胡说，尽管有如此多的改动，但这个原本残酷的青春故事并没有变得面目全非，创作团队在完全遵守讲好故事的前提下，试图将作品更深层次的内核挖掘出来。由彭远江执导的话剧《我的世界非黑即白》，显然不是一次简单的复制，而是运用现代主义戏剧手法重新解读《青春禁忌游戏》。如彭远江所说，“戏剧绝不只是简单地把文字放在舞台上，演员和导演要更加积极的成为创作的一环，把自己对故事的理解融入呈现之中。”

从《青春禁忌游戏》到《我的世界非黑即白》

上海之巅读书会：写小说的年轻人在想什么



无论是生于上海长于上海的周嘉宁，还是在2010年从浙江嘉兴来上海读大学从此便驻留在上海的王占黑，她们都试图用自己的记录为未来的上海留下她们在此时此刻看到的上海。

从左至右：主持人、《收获》杂志编辑朱婧熠，作家周嘉宁，作家王占黑

吴孜

5月22日下午于上海中心52层朵云书院旗舰店举行的《上海之巅读书会：写小说的年轻人在想什么》，是“2020收获文学排行榜”的衍生活动。

由《收获》杂志牵头的“收获文学排行榜”，创办于2016年12月，共分长篇小说、长篇非虚构、中篇小说、短篇小说等四个榜单。最终跻身“2020收获文学排行榜”的，有王安忆的《一把刀，千个字》、王尧的《民谣》、袁凌的《生死课》、邱华栋的《北京传》、蒋韵的《我们的娜塔莎》、陈河的《天空之境》、哲夫的《仙境》和唐颖的《鹭鸯姐姐》等共40篇于当年发表于全国各地文学杂志的作品。

如果要为“2020收获文学排行榜”举行一场读书会，可以邀请的嘉宾范围很广，如文坛常青树王安忆、蒋韵，或者作品很快被出版社看中、以单行本出版后获得了不俗销

他打了个电话，就此，“我”的新生活开启了。群青在东京打了多年黑工后，被遣返。回到上海正在为如何生存谋划的时候，群青接到了“我”的电话，两个野鸡大学的同学一拍即合，签了个卖服装的档口，这以后，读者开始随着两个小伙伴“纵向和横向扫荡了上海市区和近郊的纺织批发市场，如襄阳路服装市场、七浦路市场、迪美地下商场甚至传说中的虹口那边的鬼市。读者还通过“我”和群青的言语往来了解了已被拆除的华亭路市场。文学评论家金理这样评价《浪的景观》：“在个人史与社会史的交织中，《浪的景观》向一个混乱无序中又生机勃勃、边角毛茸茸还未被修剪平整的时代致敬，可谓切中肯綮。”

假如说《浪的景观》见证了一个时代的落幕，并在记录的过程中留下了刻骨铭心的青春记忆，那么，女作家王占黑的小说，则将自己作为这个时代的一个兴冲冲的旁观者，遇到感兴趣的人和事，就巨细靡遗地记录下来。在“2020收获文学排行榜”短篇小说榜单中排名第八的《去大润发》讲了这样一个故事：豪情万丈地走出大学校园成为一名小学英语老师的“我”，经历过两次失恋后，痛感独立生活并不像自己当年所想象的那样快乐。

这一天因在学校遇到了几件让“我”心烦意乱的事后，走出学校后想步行回家，借此缓解郁积在内心的烦闷。不想，路途比自己想象得要远，只好中途改变主意乘坐公交车回家。能带“我”回家的公共汽车已经下班，“我”只好听从也在车站等车的穿黑T的男人建议，搭乘大润发的免费班车去一趟大润发再说……“我们仿佛目睹的，是无数跌宕向前的生命洪流，它们不断汇聚、再分散，某一刻又奇迹般地新的时空中得以重聚。她属于那种能够在某个时刻忽然安慰到我们的小说家，以她对于人世间的汹涌不息的欢乐和痛苦的理解”，诗人、文学评论家张定浩对《去大润发》的评价，一下子点出了同为女作家“90后”的王占黑不同于“80后”的周嘉宁的地方，亦即正青春的王占黑还不慌

着去记忆青春，她正在将年轻人对生活的理解写进小说里，以此带给她的读者以慰藉。

凡此种种，都是读者关于《浪的景观》和《去大润发》的理解，那么，两篇作品的作者周嘉宁和王占黑，是不是认同读者的读后感受呢？也就是说，这两位年轻人在写作《浪的景观》和《去大润发》时，到底在想些什么？

5月22日下午，气候凉爽、空气清新。我算好了能够准时到达朵云书院旗舰店的，却因为直达上海中心52层的电梯需要限流而排了一会儿队，等我落座在朵云书院的活动区域，周嘉宁已经在侃侃而谈了。听着听着，我发现，周嘉宁之所以能够侃侃而谈，是因为她在重温自己的作品《浪的景观》，她像大多数写作者一样是一个不善言辞的人，有时候索性用非常直白的话语来拒绝主持人的提问，诸如，“我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我不太理解”等等。而王占黑呢，则用很慢的语速来消耗属于她的回答时间。遇到两位写得比说得要好许多的女作家，读书会时不时会出现片刻冷场，也就不是意外了。然而，她们断断续续的陈述，还是让我们捕捉到了“写小说的年轻人在想什么”的答案。

无论是生于上海长于上海的周嘉宁，还是在2010年从浙江嘉兴来上海读大学从此便驻留在上海的王占黑，她们都试图用自己的记录为未来的上海留下她们在此时此刻看到的上海。

正如周嘉宁所说的那样，“我也想过是不是用写日记的方式将自己每天看到的上海记录下来，那样，多年以后也就不会产生因记录缺失带来的焦虑。可我还是决定不那么做，因为我相信若干年后还留在我记忆中的上海，才是我愿意记住的上海。”以此推断，周嘉宁写作《浪的景观》、王占黑写作《去大润发》，反馈给读者的都是她们愿意记住的上海。《浪的景观》和《去大润发》从题材到趣味的大相径庭，也从侧面告诉我们，写小说的年轻人在考虑用只属于自己的风格记录上海，这就给了我们一个预告：只要写小说的年轻人笔耕不辍，文学里的上海将会多姿多彩。